

总 报 告

陕西实施“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战略思路与对策研究

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将陕西开放型战略置于国际大环境和全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纳入全省中长期经济社会总体发展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我省对外开放的战略依据、战略思路 and 战略对策，供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

一、陕西实施“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的战略依据

（一）从国际经验看开放型战略的提出

从二战后世界范围工业化的普遍经验看，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人均 GNP100 美元以下

的工业化初始阶段，各国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框架和国民经济体系，防止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冲击民族工业，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通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形式，采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中心的封闭式的内向型经济，保护正在发育成长的幼稚的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对于资源自给率较高、国内市场广阔的经济大国，多采取以初级产品出口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外贸战略；对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的一些小国和地区，也都采用过一段较短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许多才赢得民族独立，初具完整主权的国家，在刚刚驱走殖民主义者的条件下，是根本谈不上引进外资的。而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的压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也排除了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总之，经济的封闭性与工业化初期的低收入阶段相联系已成为经济发展特定时期的普遍现象。

当经济发展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人均 GNP300 美元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无论经济大国还是小国和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加大的各种要素“瓶颈”状况，使得单靠本国资源已无力解决，生产要素短缺成为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式，从外部取得资源和手段支持工业化，几乎成为众多国家的一种客观经济规律。于是，经济发展便由封闭式的内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化。在这一阶段上，小国和地区由进口替代战略迅速地转向出口导向，实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促进出口的工业化战略，实现经济起飞，韩国、新加坡等国及台湾的实绩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战略转换过程。对于诸多经济大国，也纷纷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施以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开放型战略，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各国经济发

展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往往表现为国民经济的外向化倾向，对外开放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趋势。

从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看，开放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20 世纪 60~80 年代中期，高开放度的新加坡、韩国、巴西等国及香港地区增长率显然高于低开放度的阿根廷、秘鲁、印度、多米尼加、孟加拉国等（见表 1）。

表 1 开放度差异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指标的比较

经济 发展 指 标 国 家 和 地 区	1985 年人均 国民生产 总值（美元）	1965~1985 年 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年增长率（%）	年出口增长率（1%）	
			1965~1980	1980~1985
新加坡	7420	7.6	4.8	5.9
香 港	6230	6.1	9.5	9.4
韩 国	2150	6.6	27.3	13.0
阿 根 廷	2130	0.2	4.7	3.2
马来西亚	2000	4.4	4.4	10.7
巴 西	1640	4.3	9.4	6.6
秘 鲁	1010	0.2	2.3	1.4
泰 国	800	4.0	8.5	8.4
多米尼加	790	2.9	3.7	-1.5
印 度	270	1.7	3.7	4.6
布隆迪	230	1.9	3.0	12.5
孟加拉国	150	0.4	—	7.1

需要强调，对外开放对后起国家和地区的赶超效应尤为重要，它可以回避风险多、花费大的技术开发过程，利用先行国的资本和技术，依靠自身廉价劳动力，将产品再打回到先行国市场，缩短工业化进程，这就是后起国家和地区依托开放型战

略所具有的后发优势。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人均 GNP 进入 300 美元以来 国民经济外向化倾向明显扩大，尤其是国内主导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化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阶段，尖锐的要素短缺矛盾毫无选择地把对外开放推到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陕西作为内陆省份，进一步扩大全方位开放，更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陕西实施开放型战略所面临的机遇和约束条件

1. 面临的机遇

（1）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加强，生产过程进一步国际化，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加快，出现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统一要素市场的完善，国内经济也逐渐一体化。加入世贸组织时日临近、港澳回归祖国及 2000 年之前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等，使国内一体化逐渐与国际一体化接轨，这为陕西进一步扩大对国外和国内各省区的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在国际范围内公平竞争提供良机。

（2）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 80 年代给我们让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90 年代由于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进一步朝技术、知识密集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美、日等国甚至出现将加工制造业向国外转移的“产业空心化”倾向，其结果给我们又让出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这些给陕西发展外向型产业，组织以轻纺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属资本密集型的部分机电产品出口创汇提供有利的市场条件。国内沿海地区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丧失、优惠政策不断冲销和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将大量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化“三来一补”产业向内地转移，给我省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加工能力的优势，吸收过剩劳动力，解决就业，提高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提供机遇。

(3) 从地缘区位上看,我国周边的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和中亚经济圈业已形成,陕西与它们存在经济上的互补性。陕西位于三大经济圈的中心,处于三者辐射半径之内的交汇点上。从国内区域变化分析,90年代开始的重工业化进程,经济重心由珠江三角洲北移至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和环渤海湾经济区。大秦铁路的修通和延安—神木—朔县—黄骅港铁路的修建,将我省经济融入环渤海湾经济区和东北亚经济圈;西安—安康、西安—南京铁路的修建,又将我省汇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90年代初贯通的亚欧第二大陆桥,强化我省的东西双向开放。因此,我省改革开放以来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的地缘劣势,随着90年代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整个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将逐步向东、南、西、北全方位开放转变。

(4)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货币升值,使其国内生产成本增大,纷纷向外部转移企业,首当其冲地瞄向我国。这一态势从短、中期看,有利于我省以三资企业的形式吸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日本及“四小龙”“外植产业”基地,同时也有利于扩大我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5) 党的14届5中全会,决定从“九五”开始,国家更多地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逐步加大缓解区域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具体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国内外资金流向等五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给我省实施开放型战略提供良好的国内宏观条件。

(6) 在当前国际经贸中,文化的经济职能加强。在世界各国华人圈中,炎黄文化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凝聚奋进的

精神纽带。历史上矗立着黄帝陵和炎帝祠的陕西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我省通过旅游业，充分利用以文物资源为主的人文环境优势，努力成为“中华经济圈”的精神策源地，这样就能借助海外华人经济的力量大大推动我省的开发和发展。

2. 约束条件

(1)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总趋势下，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将会加强。今后 15 年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使集团间、各国间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加之美国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把我国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加剧，不断进行歧视性报复，反倾销调查案件日益增多。人民币的对外升值，增大我国产品进入欧美市场的成本，这些给我省出口商品和进口技术带来一定的困难。

(2) 从国际金融市场分析，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工业发达国家内部资金需求增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资本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中东经济的重建，东欧、独联体经济的恢复和重振，东亚和南亚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拉美经济的恢复等，加剧了各国之间吸引外资的竞争，国际金融市场资金需求增大，据有关预测，国际金融市场近期正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今后甚至可能会出现国际资本的短缺现象，这无疑增大我省利用外资的难度和代价。

(3) 对于我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而言，亚洲和拉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泰国等）劳动集约化产业的崛起，对我省出口产业的发展构成直接威胁。同时，国内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也依仗自身的劳动力优势，相继接过沿海转移过来的“三来一补”产业，形成与我省劳动集约化产品出口创汇更激烈的竞争。

(4)1994年外资的大量进入，产生替代国内储蓄的副作用，并且成为导致国内高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外债余额截至1995年底已达1065.9亿美元，静态外债规模已接近“警戒线”，前一阶段有一股外资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套利套汇，兴风作浪；同期，国际上又发生了墨西哥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开放政策失误，致使外国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撤出引发金融危机。这些教训，给我们敲响警钟。国家决定“九五”时期将克服高通胀作为主要的宏观目标，在加强宏观调控、资金适度从紧的同时，相应地加强对外债和外汇的宏观管理，对外开放步子将迈得更慎重，过去“饥不择食”地引进外资的作法不能再重复。这对开放起步迟，正需引进大量外资的陕西，自然增加了难度。

(5)然而，最大的约束还在我省自身。我省长期以来观念封闭、开放意识差、开放度小，经济发展程度低，城乡二元结构反差大，农民收入低，体改步伐落后，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差，引进外资规模小、结构不合理，配套资金短缺、对外开放宏观管理乏力、外贸秩序较混乱、资金和退税问题突出，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迟缓，出口产品成本增大，外国旅游者平均停留天数下降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阻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致使我省开放步伐不仅滞后于沿海各省，也明显落后于中西部许多内陆省区。

总之，我省实施开放型战略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并存，但经综合分析判断，应该说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我省的体制改革若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那么就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有力地促进开放型战略的实施。

二、陕西实施“以开放促开发， 以开发求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陕西开放、开发、发展的战略框架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不是就开放论开放，而是将陕西对外开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来明确对外开放在我省总体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陕西总体战略研究表明，陕西中长期经济发展分两个阶段：（1）1996~2000 年为跟进阶段，属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开发阶段；（2）2000~2010 年为赶超阶段，即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基本实现工业化、全省进入经济社会大发展阶段。由于这两个阶段上的战略目标、主导产业和地域布局不同，由此要求我省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旅游等内容和特点也各异。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将开放型战略细化，把对外开放主要落实到促进我省经济发展两个阶段的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并落实到空间布局上。

1. “九五”时期我省以开放促开发的战略框架

第一阶段：1996~2000 年，战略目标是努力跟进全国平均水平，力争 GNP 年均增长速度达 9.5% 左右，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陕西作为资源丰富、门类齐全的内陆工业大省，资源开发及围绕其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行。因此，“九五”时期的战略任务，是以开放促资源开发，全方位开放服务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成长和升级。

围绕基础产业成长的资源开发主要任务是：

（1）矿产资源的开发。我省矿产资源丰富，全世界现已发

现 140 种矿藏中，陕西有 91 种，其中位居全国前十位的矿种近 60 种，其中铼和水泥用灰岩等储量全国第一，钼和汞等储量全国第二，煤炭、石棉、饰面用大理石等储量居全国第三位，质量很高，金储量全国第五。陕北已发现我国内陆最大的整装气田，石油资源也有一定储量。在矿产资源开发中要重点突出陕北的煤、油、气，可引进外部生产要素，联合开发。

(2) 人力资源的开发。我省人力资源呈典型二元结构，一方面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八十余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一资源配置低下，人才流失严重，仅流向深圳就有 15 万人，开发这部分潜在人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我省基础教育落后，初、中、高等教育悬殊拉大，初、中等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5%，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文盲、半文盲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亟需借助于智力开发，提高我省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支撑经济增长。

(3) 科技成果的开发。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众多，科技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三，每年完成科技成果数千项，转化率仅 16% 左右，通过开放开发，将我省潜在的和现实的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在开发高新技术的同时，我省在面上要重视适用技术的引进、开发和推广。适用技术价格便宜，因地制宜，适应性强，转化率高，适合小规模运用，有利于就业，也同我省技术构成与教育构成相适应。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4) 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军工企业）资产存量的开发。与全国相比，我省国有大中型企业比重较大，军工产业居全国第二位，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形成相当庞大可观的资产存量，但由于体制等原因，这部分资产闲置较多，工业技术装备落后，大

中型企业有 23% 的设备是 80 年代的, 47% 是 70 年代的, 甚至还有 30~50 年代的。只有通过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 对这部分企业进行高起点的嫁接改造, 方能“起死回生”。

(5) 地上地下旅游资源的开发。陕西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主要是文物资源。例如全省帝王陵墓 72 座, 居全国第一,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7 处, 也居全国第一。特点是: 朝代早、历史跨度大、规模大、文物价值高, 构成我省得天独厚的优势。“九五”时期, 通过开放, 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 可力争考虑联合开发乾陵、秦陵和桥陵, 建成全国旅游大省。

(6) 大农业的开发。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努力培植国内外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 过去开发的苹果、蚕茧、秦椒、猕猴桃已具竞争力, 还需继续开发如秦川牛、烤烟、羊绒、绞股蓝、沙棘、黑米、核桃等, 提高大农业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上述资源开发落到地域空间上, 各有侧重。陕南主要侧重生物、矿产和水资源为中心的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包括电力、建材、医药化工、丝麻纺织等), 建设我省主要原材料基地; 陕北重点抓煤、油、气的开发和综合利用(电力、化工等), 建设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作为处于工业化初期开发阶段上的陕南、陕北, 由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初级产品生产是主要的, 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时还难以超越(当然不排除有条件的国有骨干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但是这两个地区的资源开发不仅对其脱贫致富极为重要, 而且为关中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而居于工业化中期水平的关中地区在“九五”期间的重点是进行技术改造, 大规模地改造传统产业(以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存量的嫁接改造为中心)和培育新兴产业(以开发人力资源、科技成果与旅游为中心), 加快增长方式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处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为今后全国和陕南、陕北提供技术装备和市场，关中地区才可能在下世纪初实现“以关中带两翼”的战略任务。

“九五”时期为保证资源开发以及下世纪发展有充足的后劲，必须把基础设施搞上去，主要是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通讯等。从地域分布看，除了邮电通讯要全省统一抓紧建设外，关中地区重点是公路建设，贯通宝鸡—潼关高等级公路和以西安为中心的“米”字型高等级公路网络。陕南、陕北的主要着力方向是铁路，应加快修建神木—延安、西安—安康的铁路，尽早贯通包头—西安—重庆—贵阳—海南的南北铁路大干线；提前修建西安—南京铁路，打通通向华东的运输通道，为陕北煤炭外运创造条件，在 2000 年左右形成全省贯通以西安为中心的干线铁路网。

“九五”时期是我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对我省整体开发有极大的拉动作用，体制改革为陕西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和手段参与我省资源开发；同时将引进的资源运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取得更大的体制效应。

需要特别指出，陕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工业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其中水和土地资源已经严重制约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具体见分报告《关于在经济大开发中防治资源与环境破坏的对策研究》）。根据国际上一些国家“大开发带来大破坏”的教训，我省“九五”时期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在陕南、陕北实行一定程度的粗放式经营，使本来已经短缺的一些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处理不当有可能加剧开发与资源、环境、人口、社会等方面的矛盾。为此，决策部门一定要重视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我省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为子孙后代造福，由此引出我省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境外省外为保护环境寻求资金、技术援助与合作，充分运用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实行传统工业增长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转换，推动各部门、各地区、各阶层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可持续发展，并分享其成果，为下世纪前 10 年的大发展奠定基础。虽然开发阶段上环境问题难以避免，但经过我们努力，把开发带来的副作用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是可以做到的。

明确“九五”时期我省整体开发的方向和主要任务后，对外开放的内容和着力点便有的放矢。

（1）外贸战略

今后 15 年，我省总体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外贸发展战略。但由于我省当前产业素质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强，故“九五”期间仍实施以进口替代为主、出口导向为辅的战略。陕西作为内陆工业大省，生产技术落后，设备老化严重。因此，大规模地利用进口替代形式，改造老企业，为 21 世纪赶超培植生长点显得十分必要。众所周知，我国长期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以下述两点为基础的：以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为屏障，把国外制成品挡在国门之外，或对外国进口商品实行限制；

汇率高估，以减小进口成本。但是随着我国体改深化和开放度增大，这两个基础性条件已经或正在逐渐丧失，使今后实施进口替代的规模日渐缩小。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我国承诺在加入世贸组织头五年内把平均关税削减 33%，把受非关税限制的 1200 多种进出口商品削减到 200 种，并到 2000 年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一态势意味着加入世贸组织后给我国大规模

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回旋余地是有限的。1995 年 11 月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承诺我国 1996 年进口关税降幅在 30% 以上并取消进口商品 170 余项的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国务院据此作出从 1996 年 4 月 1 日起将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 23% 并调整关税结构的决策，使其回旋余地更为缩小。我省经济决策部门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在“九五”期间用好用足进口替代战略，并加快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化。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省实际，“九五”实施进口替代的主攻方向是：

第一，实现由 80 年代轻工最终消费品的初级进口替代向以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为主的上游产品的高一级进口替代转变，如重化原料、有色金属材料、冶金、建材、医药产品等，与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相适应。力争将其中一些产业在下世纪初转为出口导向产业，并从一开始就树立出口创汇意识。

第二，就轻工消费品而言，由 80 年代一般性的轻纺日用消费品向高档耐用消费品转变，如高档轻纺服装类等，借助国外技术改造我省轻纺工业，使产品上规模、上档次，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占有率。

第三，从现在开始，为下世纪陕西腾飞引进培育抢占制高点的幼稚产业，重点是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对将来有出口条件的高技术战略产业可采取边进口替代边出口导向的滚动式外贸战略。为实施这一战略设想，在“九五”规划中，我省必须在进口替代项目中确立几项类似上海桑塔纳轿车、金山石化工程、湖北二汽轿车这样一些具有规模效益，在 21 世纪初起领头作用的超前项目。

这一时期陕西的出口导向，虽然有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但客观地说，我省近、中期还不具备通过提高国际市场

占有率来带动整个行业和全省经济的出口导向产业。

当前，机电工业、轻纺工业、煤炭和技术是我省四大出口

到 2000 年，我省要彻底完成轻纺工业对农矿产品的出口替代，重点扶植机电产品对轻纺产品的出口替代（1994 年我省机电产品创汇 3 亿美元，跃为第一出口产业）。为此，要继续努力扩大轻纺工业品的出口，重点发展深加工产品出口，集中力量扶植机电产品出口，并提高其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到 2000 年陕西出口额力争比 1995 年的 12.8 亿美元翻一番，达 25 亿美元，出口总额累计超过 80 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降为 20% 以下，工业制成品比重达 80% 以上；在工业制成品中，深加工产品比重力争达 50% 左右。抓好三个“20”（即 20 个出口基地，20 个创汇大户，20 个拳头产品）。

我省实施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举的方针仍需多元化的市场开拓为辅佐。“九五”期间，陕西仍需巩固和扩大较成熟的机电产品市场和以轻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一步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市场。在地域分布上，港澳地区、日本、西欧和美国是我省向纵深发展的市场；东盟、韩国、中东市场仍将是稳定发展的市场；前苏联地区、东欧、非洲、拉美是我们今后重点开拓的市场。我们的步骤是以中心城市、骨干企业为重点，以外贸企业为桥梁，以效益为目标，坚持以质量为本，不断开拓市场，一步步地打出去。

然而，今后 5 年陕西产品要以扩大占领国内其他省区的市场为重点，即以国内贸易为重点。从操作考虑，当前亟需树立名牌意识，实施名牌战略，推出更多的名牌产品。在区域上，扩大我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应采取渐次推进的形式：首先要巩固和拓展本省的产品市场，其次是北方市场（其中西北地区是首

要目标)，然后再依次逐渐从西南市场扩大到中部和东南沿海地区。

“九五”时期我省将实施大规模进口替代推动产业升级，用工量很大。为保持我省国际收支平衡，必须把出口创汇搞上去。同时，省内基建也存在储蓄——投资缺口，因此，在保证充分动员和利用省内储蓄的前提下，更有效地将外部资金用于省内资本形成就显得至关重要。

（2）外资战略

90年代作为我省主导产业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属资本密集型产业，需大量资金投入。根据省计委跨世纪20项重大骨干工程排列，“九五”期间，全省需总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和库存增加）3171亿元，其中重点项目需固定资产投资就达1300亿元左右，通过政府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企业自筹等国内省内渠道的筹措，难以满足上述需要，还存在400亿元左右的缺口。因此，开发阶段上的头等任务，就是通过招商引资，从外部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完成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的转换，带动外贸、外经登上新台阶。

关于“九五”时期我省累计利用外资，现有三种不同方案。省计委外经处提出的20亿美元，为Ⅰ（低）方案。若按此计算，“九五”陕西GNP利用外资系数〔利用外资（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元）〕将由1995年的0.46降到2000年的0.294，总投资利用外资系数〔利用外资（美元）/总投资（元）〕也将由0.96降到0.631，显然是偏低的。省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的30亿美元，为Ⅱ（中）方案。按此计算“九五”陕西GNP利用外资系数和总投资利用外资系数，也都低于1995年的水平，与全国比较，仍存在50%左右的差距，因而也是偏低的。正鉴于此，经

过测算，我们提出“九五”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36 亿美元作为 III（高）方案（详见分报告《陕西省利用外资需求预测及其模型》）。只有这样，我省 GNP 利用外资系数和总投资利用外资系数才可能超过 1995 年的水平。同时，吸引三资企业 4000 家，其中争取吸引 10~15 个国际大财团、大跨国公司来陕西投资，完成 1/3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嫁接改造。

外资来源上，针对性地在港、澳、台以及日本、西欧、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招商引资，力争外资来源多元化。

我省外资使用的重要方向，除了鼓励外商投资于能源、交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以及环保、农业外，还必须重点投向出口创汇的产业和项目上，以减轻偿还外债负担。

在外资的地域分布上，陕南、陕北利用外资主要用于原材料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为加快两大基地的开发步伐，建议在陕南、陕北各建一个开发区，成为招商引资的载体，采取优惠政策，利用劳动力和土地的廉价优势，进一步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联合开发。在陕南，可在矿产资源或生物资源上选点；陕北主要在能源及加工转换上选一个最佳区位点，此项工作现在就可着手进行。关中地区的外资重点用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嫁接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

在外资结构上，对外借款虽然使用自由灵活，较易符合产业政策指向，特别适合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但存在偿还债务问题。外商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虽易急功近利，不利于投向主导产业而需加强引导、控制，利润部分要汇出，但不用还本付息，其资金回报率一般高于贷款，而且控制国内市场的手段途径也要多于贷款，特别适合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嫁接改造。因此，引进外资中要注意掌握二者的比

例，以外商投资为主，对外借款为辅，比例以 2:1 为好。全国 1992 年外商投资开始超过对外借款，陕西 1993 年才达到这一点，直到 1995 年才达到合理比例（见下表）。

“八五”时期陕西实际利用外资额

单位：万美元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对外借款	6354	6829	15719	20610	15500
外商投资	4574	4583	23432	23809	32400

经测算，“九五”期间，我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需要对外借款 12 亿美元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嫁接改造需外商投资 24 亿美元左右。在外商投资层次上，应以合资、合作企业为主，独资企业为辅；在对外借款上，由于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借贷利率低、期限长，应以此为主，以利率高、期限短的商业性私人贷款为辅。在借款中我省特别要注意两个问题：为避免和减小借债风险，尽量做到外资来源多元化。注意货币选择，及早进行预测，尽量避免借那些对人民币预期升值的强币，减小还债压力。

我省利用外部资金的思路还要考虑国内渠道，吸引更多省外资金、技术来陕设点、办厂，参与我省股份制改造。“九五”内联引资力争达到 26 亿元。由于东南沿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等因素，不仅外资流向已开始北上和西进，而且沿海一些企业也有向内地寻找最佳生产区位的趋势，我省一定要密切注意这一动向，改善投资环境，抓住这一机遇。